

董其昌：屋顶上画马车

韩进

很难说董其昌的画是“心画”，他不大把自我放进画里，也不着意于诗情画意的传达。董其昌为自己的笔墨赋予了一种再现和讲述的合理性。再现的是绘画史上坐标人物的典型技法，讲述的是画史脉络。这个功能性让他成功规避了自己控笔上的若干缺陷——抒情性不够，以及常常无法达到自然平淡的线条。董其昌看起来只是在画“画”本身，实验笔墨和结构。他的好处在于，虽然总是专注而用力地画画，却能不显得过于熟练（王季迁语）。董其昌练得很熟，画时又要笔笔送到，这样就容易画得满，流于熟，流于硬，甚至带上戾气。像沈周和王时敏的有些作品。董其昌一般都能避开这些陷阱，独留天真的派头。

反画史的画史仿古之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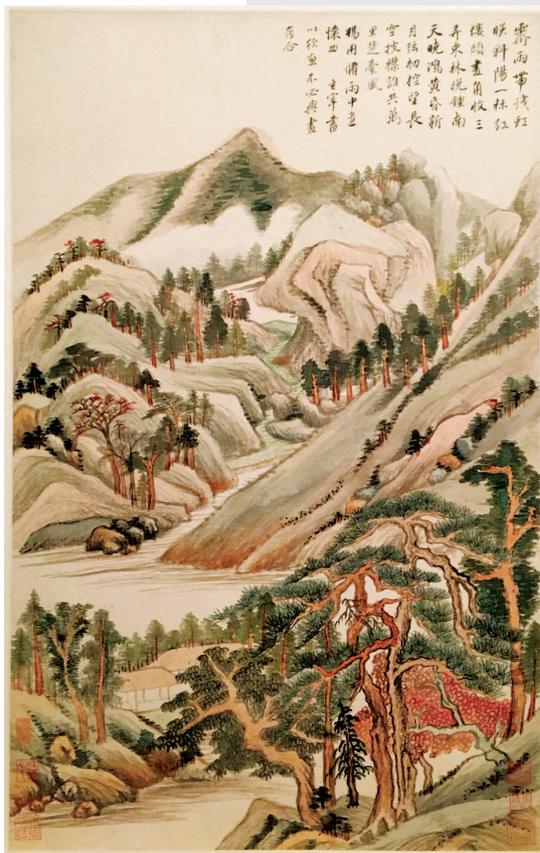
正在进行的“丹青宝筏”董其昌艺术展上，有一件来自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的册页。尺寸较一般的册页都大，据

称是董其昌绘画册页中最大的。起首一页已叫人移不开眼睛（图一）。画面不生疏，是常见的近、中、远三景模块组成的一幅山水。细看却颇不寻常。册页以“仿古”为题，题写仿李成、燕文贵、王蒙等人。这一页却没有具体点明是在致敬哪位大师。整幅画看上去拍塞满纸，但可以轻易地分割成几个部分（图二所示）。若以宋元大师最标志性的技法作为依据，可以简单化地把这五部分归属如下：1 王蒙，2—4 黄公望，5 米芾。只不过，它们在这里多多少少都脱离了惯见的结构功能和形体比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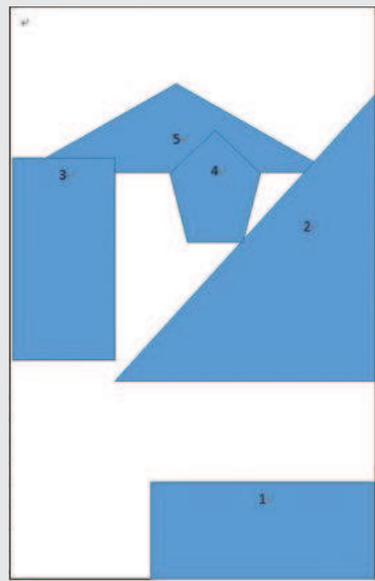
1号土石上的松树，一望而知是王蒙的造型风格。愈右愈高，衔接右边的2号斜坡。斜坡多做左右护法，此处却大得出奇。它从右边框一直往左延伸到画面横向三分之二的地方才接入水面，只见一个壮硕的坡脚稳稳地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。3号山脉连亘，是常见的山水龙脉，这里则局隅一角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

（下转10版）➡

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、影响巨大的一代书画大师，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，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。这位书画大师身后的是是非非，几百年来可谓争执不断。2018年12月7日，“丹青宝筏——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”在上海博物馆开幕，一时观者云集，这也是大陆举办规模最大的董其昌艺术大展，向世人全面展示了董其昌及其所处时代的艺术成就。



图一 董其昌《仿古山水册》之《雨中遣怀》 美国纳尔逊·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



图二

◀（上接8版）

群、劳榘、余逊等先生参与整理与释读，前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。贺先生的整理释读成果有《汉简释文初稿》线装稿本16册，2004年由贺先生的女儿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，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，精装二册。以题字可知，劳榘先生之作出版后半年，贺昌群先生即购入此书，并以手中的释读底稿加以校勘。据贺先生之女贺龄华所撰《贺昌群（藏云）生平及著述年表》（《贺昌群文集》第3卷，商务印书馆2003年，第647—679页），贺先生1941年应聘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，1946年东归南京，1953年入京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，故此书自应是在重庆期间购入。今比对二书，看到在“甲渠官 王彭印 四月乙丑卒同以来”简文上的眉批，笔迹、内容相同，看到被陈寅恪先生誉为“翰林字”的贺先生手迹，当年前贤于北京、于板栗坳勉力治简的情形

跃然纸上，不由心生敬意。

此289号《居延汉简考释》末页有“南京泮池书社”印章，不详何以流入该社。据《贺昌群（藏云）生平及著述年表》记载，贺先生藏书有两次外流。一次是1948年举家迁至夫人原籍浙江富阳里山，此后携至里山的数千册诗文史籍全部在土改中散失；一次是1969年痛彻于同人珍藏的书籍竟然作为废纸卖与废品收购站，遂写信给杜甫草堂，愿将有关杜甫研究的汉唐间典籍捐赠草堂，以免厄运，此后成都图书馆接受了贺先生近三千册函的捐赠书籍。大庭先生购入此书的经过，在他的绝笔遗稿《留存在木片上的文字——中国木简的世界》结语“书与人与木简”中有简要记述：“从伊利诺伊回来一二年后，偶然在东京的书店发现这一文物在目录之中，于是入手，编号为289号。以我的经验而言，书籍是相隔50年才从眼前一过，如果当时不决断，就将永远无关。”（2003年，第164页）可

知大庭先生大致是在1990年前后购入此书，书由东京文德书房售出，售价为34000日元。贺昌群先生1943年购入的《居延汉简考释》，近50年后入手于日本汉简研究学者大庭脩先生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缘。

大庭先生书斋另藏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出版的铅印本《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》第二册。此书原为两册。1951年9月，大庭先生在京都南禅寺福地町偶遇藤枝晃先生，第一次听到“居延汉简”之语并受到加入京大人文研汉简研究班的邀请。当年冬天，大庭先生通过长途电话向东京文求堂订购了此书，次年加入人文研的研究会。此书价格20元，是当时月薪的四分之一。大庭先生是向学校借钱购买的此书，而还款则来自翌年婚礼上的同事礼金。40余年后大庭先生在《汉简研究》“书后私语”写道，“是将此书入棺还是留存世上，这是经常考虑的问题，只是目前还没有结论”，足见对此书的看

重。而据《留存在木片上的文字——中国木简的世界》“结语”与博子夫人的“后记”所述，大庭先生已于2002年10月20日在病榻与博子夫人约定，第一册与己相伴永远（原文为“入棺”——笔者注），第二册与妻子相伴永远（第164、185页）。约定后仅月余，11月27日大庭先生病逝。

今次在大庭先生书斋寓目此书的第二部，书已泛黄，纸张脆薄，外裹以素笺，书“博子用”三字，捆扎素笺的线绳外形完好，然而取拿时一触即碎，想必自约定后此书一直静置未动。在得知第一部已于16年前随大庭先生火化后，一时动容。笔者1989年留学关西大学，受业于大庭先生，同时也得到博子夫人的亲切关照。1989年日本改元平成，至今平成已历三十年，NHK播放的专题节目“平成史”正在历数大事。而在此平成三十年之际，详知大庭先生自用铅印本《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》的一二册之别，又如何

令人不感叹学者的执着、世间的真情。

一部石印本289号《居延汉简考释》，在75年的岁月中留下了劳榘、贺昌群、大庭脩三位简牍学者、中国史学者各自的学术足迹，令人忆起1931年的居延、1932年的北京、1943年的李庄板栗坳、1951年的京大人文研、1955年的同志社大学启真馆、1992年的关西大学百年会馆、2002年在大阪日赤医院病房与大庭先生的最后一见……时艰世治，学问不灭。

林甘泉先生在为《贺昌群文集》所作的序言中，以清人戴震“学者当不以人蔽己，不以己自蔽，不为一时之名，亦不期后世之名”概括贺先生一生的治学精神，喧嚣浮华之下，斯言尤当引以自律。

感谢吉村昌之、大庭利子、闫振宇、舒哲岚为本文提供的帮助，感谢郭永秉教授、博士生黄巍的指正。

（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）